

张士尊 / 著

清代东北移民

与社会变迁：

1644--191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士尊 / 著

清代东北移民 与社会变迁： 1644—191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

著 者	张士尊	封面设计	翁立涛
责任编辑	谷艳秋	责任校对	王 杰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875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143-9/K·165
定 价	28.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序 言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边疆、特别是北部边疆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的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治理边疆，就成为历代政治家和学者们思考和讨论的永恒话题。今天，与传统社会相比，边疆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治理边疆的手段也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就边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来说，则与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边疆问题仍然是摆在政治家和学者们面前一个不怎么轻松的话题。十余年前，作者开始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中国北部边疆历史问题上，并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学术论文和专著，给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00年作者来东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供的选题方案之一即“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后来经过我们的讨论，把其确定为博士论文题目。作者之所以选择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基于下面三点考虑：一是通过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探讨清代边疆政策的变化，从而为边疆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二是通过清代东北移民活动对区域社会影响的研究，寻找数千年来东北社会变迁的规律；三是通过对东北边疆地区人口进出与社会变迁关系的解剖，为进一步研究和总结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史提供根

据。三年来作者一直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收集梳理资料，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几十万字，就是三年来不停地阅读和思考的结果。

关于清代东北移民的历史研究，从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专门的著述不多，成果也不太显著，而且多散见于东北地方史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东北移民史或清代东北移民史的专著出版。就具体研究手段而言，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上，真正把东北移民与整个东北边疆地区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著述还难以见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此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填补了一项“空白”，或者说，此书的出版为今后东北移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纵览全书，我认为作者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一是作者努力去寻找边疆历史的发展规律。边疆与内地有很大的区别，这不仅仅表现在地理空间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化差异上，即边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民族结构和文化精神结构上与内地的明显区别，而且这种差异和区别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变化，有时甚至很大，无疑作者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满足于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认识，而是继续努力去探求造成这种差异和促使这种差异变化的原因并寻找出变化的规律。在本书中作者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概念“边疆文化过渡带”，这个边疆文化过渡带中的文化与内地的文化有很大的区别，与边远地区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区别，它既包括内地的一元的文化结构，也包括边远地区多元的文化结构，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文化过渡带有时向南收缩，有时向北延伸。它的存在和伸缩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作者认为是人，因为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具体地说就是北部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南迁，内地汉族人口不断北上，两者相互交汇于东北南部，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边远地区的混合的文化结构，这是边疆文化过渡带存在的根据。至于过渡带的伸缩，与

这个过渡带中内地移民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比例有很大的关系。清代，通过不断的移民活动，大量的内地人口进入东北，使这个过渡带不断向北延伸，清末终于到达黑龙江沿岸，东北社会完成了它的内地化过程。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一个概念或者一种“假说”，可能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工作要做，特别还需要一个严格的科学的“证伪”过程，但是，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整理，有理有据的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与完全出于思辨的“概念”或“规律”有很大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讲，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作者力求构建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总结学术史，在历史研究中有两个倾向应该避免：一是为考证而考证。历史研究中考证是必备的手段，但是研究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光靠考证是难以奏效的，为考证而考证，只能导致支离破碎，所谓“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二是理论在先，史实为理论作注。历史研究中思辨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思辨而思辨，特别是先有概念而后寻找论据，只能导致历史研究的空泛，甚至曲解历史，这样的教训我们是很深刻的。正确的态度是在对历史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框架之内展开问题，进行考证、对比、推算、分析，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可分可合，浑然一体。作者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大努力的。他把东北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社会，然后从三个视角对移民给予社会变迁影响进行研究：即清代东北移民政策变化过程研究—过程分析；清代东北移民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构分析；清代东北移民对东北区域功能变化的研究—功能分析。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东北移民对东北区域社会变迁的整体研究。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部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留待以后去完成，但是，从现存三部十章来看，作者构建的整体结构可以说是合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赞赏的。

三是史论结合上有独到之处。在本书中，史料引证辨析和数

字推算列表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多数都是前人所没有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经过作者的研究才得到初步的解决。为说明问题，我在这里仅举一例：明朝末年，清朝初年，辽沈地区有多少居民？人口史、移民史、东北地方史、明清史，都曾经做过估算，百万以上有之、数百万亦有之，但作者通过非常有说服力的考证，得出明末清初辽沈地区人口不到 50 万，满洲人口不到 20 万的结论，是非常客观和可信的。正是通过这一个个考证研究，才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一步步地提升。除了这些考证推算以外，在本书中的理论使用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作者日常读书庞杂，涉猎较广，所以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借用了其它学科的一些术语和方法，如劳动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等，虽然最后定稿时有意地把一些术语删除，但细心的研究者仍然能够从其论述中看到这些方法的影子。删除一些生僻的词语是必要的，但借用一些学科的术语和方法是可取的，正是这些新的方法和角度给本书的分析增加了一些力度。

作者是一位学风严谨、努力进取又不缺乏睿智的人，从他几年来对中国北部边疆问题的研究看，他对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是比较清楚的，他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现实主义者，他正在按照自己的步伐一步步地接近目标，我想这本书的出版是他向既定目标迈出的一步，作为导师，我为每位学生的进步而高兴，当然也包括作者。是为序，以期共勉。

赵毅
2013年4月11日于华南师范大学

引 言

清朝兴起前东北移民问题的历史回顾。在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东北与中原基本上保持同步发展,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东北社会发展又有其区域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产生的基础就是东北的边疆环境。从地理位置看,东北处于东亚大陆的边缘,所谓“辽,绝也”,就是距离中原地区十分遥远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说,东北已经到中原王朝统治在东北方向的地理极限;从政治结构看,东北处于中原王朝整个天朝体系的边缘,介于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郡县制度与羁縻控制之间;从民族构成看,东北民族众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区别明显,民族矛盾与民族交往共存;从文化属性看,东北有中原地区成熟的文化成份,也有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成份,还有边远地区原始的文化成份。总之,作为边疆地区的东北社会,与中原相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多元的特性。这个特性的增强与减弱,与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一统天朝体系的盈缩,人口的进出有直接关系。

东北移民始于何时?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金牛山人当是迄今为止东北最早的原始人类,距今大约

28 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1〕}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文化遗址在东北共有 30 余处,^{〔2〕}属于新石器文化人类遗址,比较著名的就有 60 多处。^{〔3〕}不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其内涵基本上都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相一致。毫无疑问,东北原始文化是中原文化向东北延展的结果,是中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数十万年里,我们的先民经过不断地迁徙,把中原文化带入东北,先是在辽河平原,然后逐渐北上进入松花江平原,以至更北地区。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先民的这种迁徙要经过数千年,甚至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由于东北有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某一段时间里,定居于东北地区的先民在世代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开始形成有别于中原的文化类型。^{〔4〕}东部山区的居民保留着原始的渔猎经济;西部草原地区居民从事游牧经济;南部平原地区的居民发展农耕经济。后来分布于东北部的肃慎、西部的东胡、东南部的涉貊先世可能与这些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发生联系。

据古文献记载,在尧舜时期,中原王朝就对东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事实上,且不说尧舜等人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就是后来的夏朝和商朝其统治区域也是十分有限的,说尧舜时期就对东北进行有效统治,与后来儒家大一统观念有关,但是,说这个时期各族先民进行频繁的迁徙则是有根据的。“在距今五千年的时代,亦即中华民族最初的文明萌生的时代,还无所谓统一的‘华夏之族’,……大家都是蛮、夷、戎、狄……的时代。”从发生学意义上说,华夏民族的产生应该是来自东方的华族与来自西方的夏族斗争和融合的

〔1〕 吕遵谔著《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5 年 2 期。

〔2〕 傅仁义著《东北地区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及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0 年 1 期。

〔3〕 薛虹、李樹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48 页。

〔4〕 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19 页。

结果。^{〔1〕}华夏文化大约形成于夏朝时期,其中心在河南中部、山东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中原地区。来自东方的华族是东夷族的一支,来自西方的夏族是西戎族的一支,两族的迁徙和融合是中原华夏民族产生的基础。就华族而言,主要活动于山东西部地区,属于东夷族系。夏商时期,东夷各支主要活动于今山东河北和东北地区。东夷各族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东北的“九夷”与中原的“东夷”同源。既然如此,东夷族的一支华族从哪里来?如果从东北跨海而来或沿海而来,那么,华族就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迁移南下中原的东北土著民族。华夏融合以后,通过移民向周围地区进行文化传播,而周边地区的非华夏文化也通过移民活动向中原进行渗透。在这种传播和渗透的双向交流过程中,华夏文化日益成熟,汉民族逐渐形成。

在东北地区正式设立行政管理机构的王朝是周朝。周朝的统治中心在黄河中游的镐京和洛邑,周朝灭商以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等地还活跃着众多的民族和部落,他们被周人统称为“夷”。周朝通过“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方式达到控制这些民族和部落的目的。周初,齐、鲁、燕相对于周朝来说是边疆地区,而东北属于燕国,则当是边疆的边疆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周初的齐、鲁、燕等国与周朝统治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差距,社会发展也不同步,边疆多元文化特点较为突出。如何面对这种多元性,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齐国“因其俗,简其礼”^{〔2〕},鲁国“变其俗,革其礼”^{〔3〕},使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逐渐融合,到春秋初年,经过数百年的社会变迁,原来活跃于山东河北等地的东夷部落或在“以夏变夷”的渐变中消融于汉族共同体内,或在“尊王攘夷”的

〔1〕 庄春波著《华夏东西说》,《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司马迁著《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

〔3〕 司马迁著《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口号下远徙东北地区。从此,中原华夏文化广被于山东河北等地,中原文化的地理边缘被推进到渤海燕山以北地区。

周初封召公到燕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按照周礼封建藩国“授民授疆土”的规定,召公受封时就已经把大量的人口随之迁移到北方边疆地区,这就为把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北方边疆地区传播创造了条件。战国时期,燕国在东北南部地区设辽东、辽西等郡,并在其北部修筑长城,把东北南部地区纳入直接统治的范围。长城以南地区的人口当主要来自三个部分:一是中原地区北上的移民,包括从内地经辽西走廊进入东北的移民,也包括从山东半岛渡海进入辽南地区的人口。二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和部落。如辽西地区的山戎、孤竹、令支都是比较活跃的方国,春秋末期消亡。貊族,周初分布很广,西到山陕,东至辽东,春秋时期,貊人大部分迁徙到燕北和东北南部,燕筑长城以后,貊人大部分当与迁入的汉族融合。三是西部和东北部各部落的南迁,这其中包括北部的肃慎等部。以上这三部分,组成了当时辽东、辽西二郡的主要人口。燕在东北南部设治和修筑长城,使东北的人口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长城以南地区,居民主要是当地的土著与南下的民族和齐鲁燕赵的中原移民,土著和南下的民族主要从事游牧和渔猎生产,北上的中原移民则带去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两者汇流,在辽河流域形成一个人口的密集区。由于居民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这个人口密集区内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多元特点,即“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与民矣”,实际是一种农业、畜牧、渔猎三种文化的混合产物,我把其暂称之为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北到长城,南到渤海,过渡带的南部是齐、鲁、燕、赵中原文化核心地区,这个过渡带的北部是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辽阔分布。

辽东、辽西设郡和修筑长城后,在东北南部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给东北北部人口南下和中原人口北上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是东北南部人口迁入的一个高峰时期,到西汉武帝时东北南部的人口达到了 70 余万,^{〔1〕}其大部分是中原的汉族人口。西汉政府在东北南部设郡县管理居民,设都尉管理少数民族和镇戍地方,使得东北南部地区中原化倾向越来越强。

东汉时期,由于北部匈奴等部的侵扰,特别是经过西汉末年的中原战乱,中央政府对东北边疆控制能力减弱,东北南部地区的汉族人口减少,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加大。汉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南迁朝鲜半岛和中原,少数民族人口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南迁,这种迁入与迁出的移民活动明显地反映在东汉辽东各郡的人口减少和行政机构设置变化上。如辽东郡原辖 18 县,东汉减少到 11 县;辽西郡原辖 14 县,东汉减少到 5 县;右北平原辖 16 县,东汉减少到 4 县。各郡人口与西汉武帝时期比,减少得更为明显。如西汉辽东、辽西二郡人口 624864,东汉时期辽东、辽西二郡人口 163424,只有西汉人口的四分之一,减少人口四分之三。^{〔2〕}乌桓、鲜卑、高句丽人口南迁长城以南,没有改变其部落的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随着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减弱,东北边疆地区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东北边疆这个过渡带中的一元化倾向慢慢减弱,多元化倾向抬头,并逐渐占据上风。

东汉末年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民不聊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生数。”^{〔3〕}但东北南部地区,却由于公孙氏的割据,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成为中原人民理想的避难所,中原士族大姓纷纷前往依附,见于史载的名士就有管宁、邴原、王烈等十余人,其它不见经籍的当更多,这对中原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无

〔1〕 班固著《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 范曄著《后汉书》卷一一〇,“志二〇:郡国二”。

〔3〕 陈寿著《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疑是十分有利的。这个时期东北的人口,特别是东北南部地区的人口中的汉族比例应该有所回升,东北社会中的一元化趋势有所增强。但到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讨灭公孙渊,将中原地区的流亡汉族人口强迫迁回原籍,东北南部地区的汉族人口再次减少,边疆一元化趋势减弱。

曹魏和西晋二朝,中央政府对东北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东北社会潜伏着巨大危机。西晋末年战乱,中央政府对东北统治失控,活动在东北西部地区的鲜卑贵族慕容氏建立燕国。随着慕容氏建立政权,从太康六年(285年)到永和二年(346年),共六十余年时间,光前燕从东北北部和中原掠夺人口就有30多万,结果在辽西地区,形成一个既不同于中原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不同于北部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结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点。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入,社会文化中一元化倾向逐渐抬头,并开始占据上风。可前燕灭亡以后,王公贵族和鲜卑民众4万余户被迁往长安,辽西地区的人口锐减。以后鲜卑贵族先后在辽西地区建立后燕、北燕,每次亡国,人口都大量南迁中原,辽西地区人口更少。

在鲜卑慕容氏兴起于辽西的同时,辽东的高句丽开始强大。高句丽的人口来源有三:一是征服晋朝辽东地区人口;一是高句丽、夫余和靺鞨的南迁人口;一是南下征服朝鲜半岛的人口。高句丽统治东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实际是把自东汉以来东北边疆地区的一元化倾向越来越弱,多元化倾向越来越强的趋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自秦汉以来东北南部地区一直由中央政府进行郡县统治,已经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和统治模式,这种传统和模式深深地影响了历朝的决策者,逐渐成为中央政府治理东北边疆的思维定势。隋朝建立以后,把东北南部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开皇十八年(598年)开始,隋朝为收复辽东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唐朝乾封元年(666年),唐军最后征

服辽东,高句丽投降,东北重新回到中央的怀抱。唐朝灭亡高句丽以后,在其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1〕}汉晋时期,为管理东北的少数民族各部,中央政府曾设置护乌桓、东夷校尉等官职来管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但是,严格地说这种管理只是监督,属于羁縻统治的一种。唐收复辽东以后,在统治方式上采用了这种中央政府监督,保留原有各族酋长管理权限的办法,这不能不说是汉晋东北南部地区郡县统治的一种倒退。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主要还在于汉族人口的稀少,在总人口中不占主要地位。由于大量人口迁往中原,在安东都护府建立之初,直接统辖的户数才 1582,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天宝年间,户数才增长到 5718,口数达到 18156。由于边疆不稳,上元三年(676 年),唐朝把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辽东故城。开元二年(714 年),又西迁平州,天宝二年(743 年),迁于辽西故城,到唐肃宗时期,安东都护府废除。唐朝没有达到恢复汉晋对东北南部地区的统治,一个重要原因是边疆的移民政策不利,数十年里,唐朝不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向东北地区移民,反而把大量的人口迁往内地,结果使东北南部地区的汉族人口比例太低,迫使其不得不采取由中央政府监督,由各族酋长自行管理的羁縻统治方式,最后不得不从东北南部地区退出,使得此地的多元化倾向更为突出。

与高句丽兴起同时,东胡族的一支契丹也逐渐南下定居于西辽河地区,到唐朝中期,契丹逐渐强大,经常南下掠夺中原人口。唐天祐四年(907 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称可汗。后梁贞明二年(916 年),阿保机即皇帝位,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契丹建国以后,也如历代在东北南部建立民族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一样,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东北南部积聚人口。辽朝五京,其上京临潢府、东京辽

〔1〕 刘昫等著《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

阳府、中京大定府的管辖范围属于东北,据对《辽史》地理志的统计,上京临潢府直接管理 10 县外,另辖军、府、州、城 25,其中有明确记载户口来自于移民的共有 24 州县,总户数是 45000。其移民的迁徙时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和太宗统治时期,移民来源主要是东北北部的渤海和女真地区。^{〔1〕}《辽史》地理志记载 16 个头下军州,共占有 33800 户。头下户的身份都是奴隶,大多为战场俘获,都属于一种特殊身份的移民。^{〔2〕}辽朝的东京,原为渤海故地,天显三年(926 年),辽把东北北部渤海居民大部南迁,升辽阳为南京。契丹初年,大量人口被契丹迁往辽河上游地区,所以导致渤海故地八十多个州县废弃。^{〔3〕}渤海灭亡以后,辽朝向东京道回迁居民,主要是把一部分中原人口安排在东北中部和北部,把一部分辽西居民迁往东北的东部。中京大定府共有 19 州县,其居民基本是外迁,主要是由从中原和渤海掠获的人口组成。

十二世纪初,原活跃在松花江中游地区的女真族兴起,女真领袖阿骨打于 1115 年正式反辽,建立金朝,第二年攻克辽朝的东京辽阳府,四年以后攻占了辽朝的上京临潢府,1122 年攻占辽朝的中京大定府,辽朝的天祚帝逃亡西京,在短短七年时间,东北被金朝完全占领。正因为金朝进军和辽朝瓦解的迅速,东北很快易手,辽朝东北南部和西部的居民免除了大规模的武装移民。但金朝在夺取中原之前,与辽朝一样,都是偏于东北的地方民族政权,为了充实“内地”,同样要把中原人口向东北迁徙。总结起来分析,金朝迁徙人口在夺取中原之前和夺取中原之后,有截然相反的方向,太祖太宗时期,主要是把中原人口向东北迁徙,而完颜亮和世宗时期则把人口从东北向中原迁徙。就前者而言,金太祖和金太宗统治

〔1〕 脱脱等著《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

〔2〕 脱脱等著《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二:上京道”。

〔3〕 脱脱等著《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东京道”。

(1115—1135年)前后大约二十年时间,有几次大规模的从中原向东北的移民活动。一次是灭辽攻占燕京;^{〔1〕}一次是灭北宋攻占汴梁。^{〔2〕}两次迁徙中原人口有数十万。金朝的统治中心从东北转移到华北以后,京师已经从会宁迁移到中都,为了巩固根本,大量的女真人口和其他各族人口迁往内地。据《金史》记载:金朝中期,河北山东一带共有“宗室户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3〕}猛安谋克制度是女真基本的社会组织制度,猛安谋克中的成员以女真为多,这里提到在中原的猛安谋克有615624户,如果以每户5口计算,也有人口300多万,即使有一半是女真,那么从东北迁入中原的人口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根据《金史》和《辽史》地理志比较,在金代中后期,也就是金朝向中原地区移民以后,金代东北各路人口比辽朝各路人口增加一倍以上,金代东北总人口约有150万左右。东北地区可统计人口数远远超出以前的历朝历代,也超出以后的元代和明代,形成东北历史上人口的高峰。金朝末年和蒙古初年数十年的战乱,很多人口死亡,也有很多人口逃亡边远地区。元朝建立以后,东北划为辽阳行省所辖,所属辽阳、广宁府、大宁、东宁、沈阳、开元、合兰府水达达等七路。根据《元史》地理志七路残缺的户口数字统计和估算,元代中期,辽阳行省总人口大约为60—70万,不足金朝东北总人口的一半。

元朝末年,经过红巾军进入辽东和朝鲜,^{〔4〕}明朝初年,东北又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于北元和明朝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迁徙军

〔1〕 脱脱等著《金史》卷四六,“志第二七:食货一”。

〔2〕 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据《燕人尘》一书估计:整个天会(1123—1137)年间,金军光“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

〔3〕 脱脱等著《金史》卷一四,“志第二五:兵制”。

〔4〕 宋濂等著《元史》卷四六,“顺帝本纪”。

民,东北南部人口急剧减少,辽、金、元时期人口最为密集的辽西地区成了无人区,辽河以东地区的人口也只剩下10万人左右。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收复辽东,在东北南部地区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并陆续在辽东都指挥使司境内建立卫所,通过考证,这些卫所的大部分人员为外迁人口,其主要为山东河南等地的居民,其次为东北北部各族人口,由于设置卫所和迁徙居民,辽东都司境内人口达到了50万左右。永乐年间,明朝政府调整东北边疆战略,在北部地区广建卫所,对各族进行羁縻统治。与此相配合,明朝政府采取两项有利于各族南下的措施,一是鼓励各族居民迁入中原和辽东都司境内居住,二是鼓励各羁縻卫所到京师朝贡,通过“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加强与边疆地区的联系,这都直接刺激了东北北部各族各部的南迁。到明代中期,原来活动于朝鲜半岛北部和长白山区的女真建州部已经南迁浑河和浑江上游居住;原来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沿岸的海西各部已经南迁到辽东边墙北部居住;原来活动于大兴安岭东麓的蒙古兀良哈三部已经南迁辽西和辽河套居住。不同文化的各族各部南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但也带来了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明朝边疆危机也同时到来。

回顾清朝兴起以前的东北移民历史,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在东北南部形成的文化过渡带中,当中央政府加强对东北边疆控制时,有利于中原人口的迁入,这个过渡带中一元化倾向增强;当中央政府对边疆失控时,汉族人口南迁,北部少数民族人口南下,这个过渡带中多元化倾向增强。战国时期,这个过渡带中多元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随着中原人口的不断迁入,一元化倾向越来越强,到西汉时期发展到顶点;东汉以后,由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控制能力减弱,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南迁,多元化倾向逐渐增长;公孙氏统治时期,通过吸引中原移民,一元化倾向开始抬头,但随着公孙氏的灭亡,中原人口大量迁回,多元化倾向又占上风。慕容氏统治时期,通过从南北两个方向迁徙大量人口会聚在辽西地区,一